

南乡春色

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

广西人民出版社



徐杰舜 刘小春 罗树杰 著

南鄉

一个壮族乡社

南 乡 春 色

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

徐杰舜 刘小春 罗树杰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8.875印张 插页6 221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19-01664-6/G·410 定价：5.10元

K281.8

5

✓

徐杰舜 刘小春 罗树杰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春色

会文化的变迁

《南乡春色》编辑委员会

主 任：孙孝通

副主任：吴品亮 何愈松 吴品喜

杨以诚 覃锡祐 莫纪灵

委 员：周承文 吴望汉 李永芳

钟昌远 覃福强 何家发

蒙日宁 韦能气 容常业

陈昌彬 覃恩照 何世添

韦家来 吴望如 吴素世

潘洪文 何兴来 陆耀敬

覃恩耀 潘家录 蒙祖进

覃福和 李泽裕 廖家庆

覃恩玲

审稿人：覃锡辉 吴品喜 吴望鸿

覃锡祐 吴望蔚 覃恩世



龙水金矿



鱼跳电站



南乡松香厂



光明化工厂南乡车间



南乡待运的木材

摄影：徐杰舜



摄影
徐杰舜
刘小春
莫纪灵

南乡镇领导班子成员



南乡中心小学



南乡中学教学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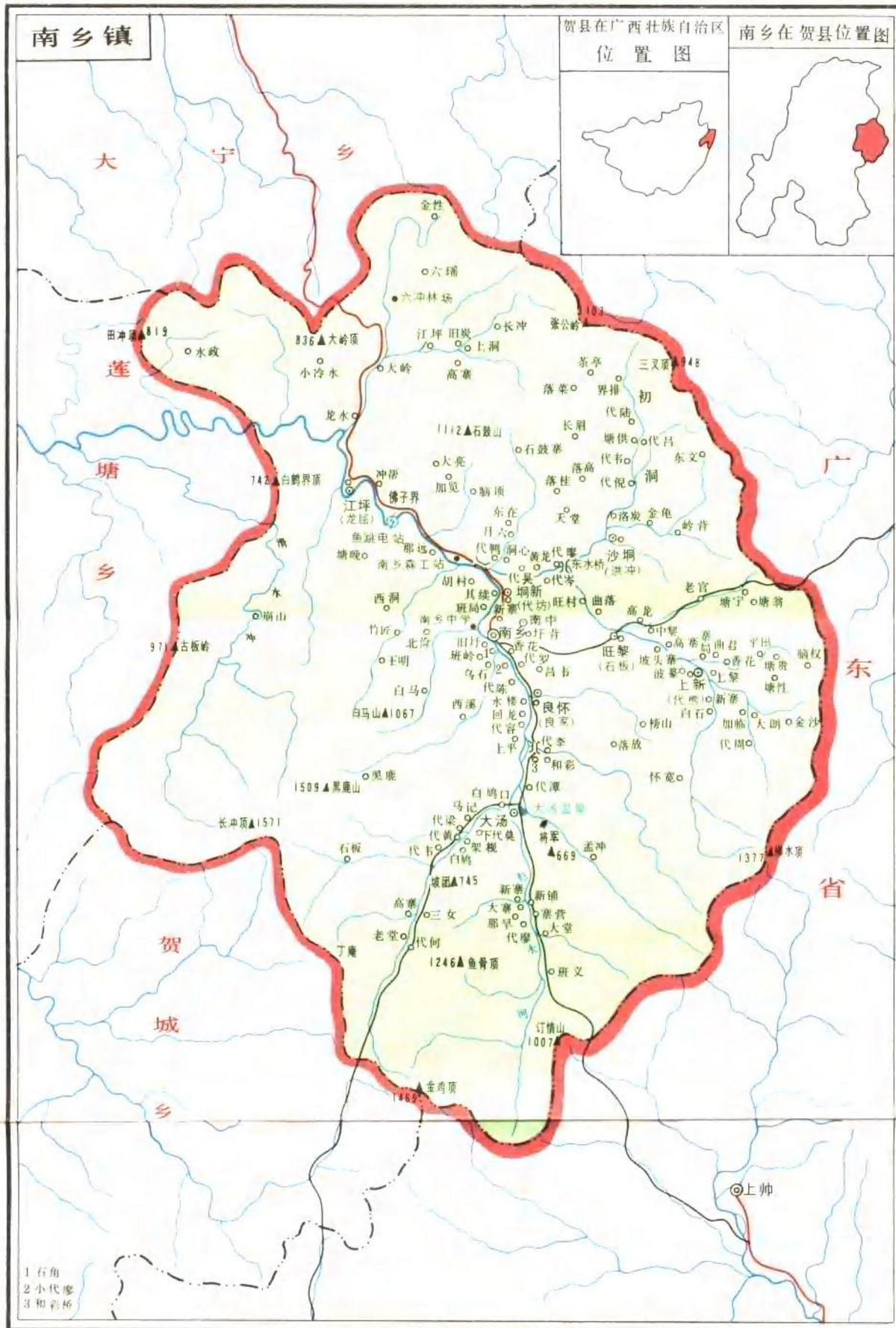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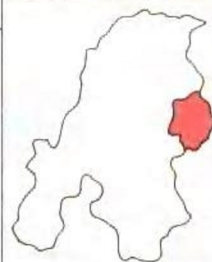


南乡壮族新楼



南乡壮族旧房

贺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位置图



- 1 石角
- 2 小代廖
- 3 和彩桥

刘汉生序

贺县南乡，山青水秀，人杰地灵，是壮族同胞聚居的一个美丽乡镇。南乡的壮族人民爱国爱乡，勤劳善良。长期以来，他们与散居在这里的汉族兄弟一起，共同耕耘开发南乡的山山水水，披荆斩棘，繁衍发展。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南乡，壮族同胞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用他们的聪明与智慧，编织山乡秀美的画图，使南乡踏上了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南乡的发展史，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的缩影；南乡壮胞的发展史，是壮族发展史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晶莹剔透的浪花。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教授徐杰舜等同志深入南乡壮寨考察，遍访壮族父老，广泛收集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撰写成《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一书。该书溯本追源，从400年前60个壮族兄弟开山落籍南乡写起，比较系统、全面地叙述了南乡壮族社会的发展历程。作者以浓重的色彩，生动的语言，着力描写了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年中南乡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从而把壮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热爱山区，建设家乡，走上脱贫致富、繁荣进步的创业历史，展示在人们的眼前，读后令人振奋，使人鼓舞。

《南乡春色》着手于微观，着眼于宏观。作者写的是一个少数民族山乡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创业史，而字里行间突出地反映了炎黄子孙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精神，是一本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愿广大读者从《南乡春色》中获得教益，愿南乡人民从《南乡春色》中得到激励！

1990年2月13日

于广西贺县

(刘汉生为中共贺县县委书记)

陈彬全序

了解国情，要从了解乡情做起。作为一个地方的基层干部，既要了解国情，使之全局在胸；又要了解乡情，使之局部在握。多年来，我们做基层工作的同志常常有感于缺少有关国情、乡情的书籍，现在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徐杰舜副教授等同志，与南乡的干部和群众相结合，写出并出版了《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一本了解乡情的好书，阅后颇有感触：

一、要充分认识解放40年来的巨大变化。

解放40年来，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究竟有没有成绩？成绩大还是小？《南乡春色》从一个乡镇的范围给人们作了明确的回答，以小见大，难道我们不是可以从南乡的“春色”中，看到我们祖国40年来发生巨变的历史脚印吗？

二、要充分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形成一股历史潮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改革、开放究竟有没有成绩？成绩大还是小？《南乡春色》也给人们作了响亮的回答，正如在南乡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壮族干部所说：“这十年的变化是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了解国情和乡情，可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更可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从而激发人们的奋发精神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

此，我要感谢《南乡春色》的作者为我们了解国情和乡情提供了一本好书，并郑重地推荐给读者！

1990年2月17日

于贺县八步

(陈彬全为贺县县长)

孙孝通序

弹指一挥40年，南乡，这个过去富饶而贫穷的壮族山乡，终于开始走上富裕之路。

忆往昔，壮族同胞自明代落籍南乡之后，4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披荆斩棘的艰苦开发，虽然开辟了南乡历史的新起点，但以压迫和剥削农民为特征的封建社会，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并没有给南乡壮族带来进步和繁荣，人们仍然过着衣不保暖、食不饱腹的贫穷生活。看今朝，南乡社会、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摘掉了贫穷的帽子，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开始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经济生活方面，农业的变革、林业的兴起、乡村工矿业崛起、畜牧渔业的进步、交通的通达、商业的兴盛、人民生活的改善，展现了南乡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一幅新图画；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教育的发展、民族文化的繁荣、服饰的衍变、饮食的渐变、居住的巨大变化、婚姻家庭的嬗变、人生礼仪的时移俗易，又给人们奏出了南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交响乐曲。是啊，南乡40年的变迁，已是今非昔比了！

读了《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社会文化的变迁》，使我们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看到了南乡壮族落籍以来，在解放后发生巨变的历史轨迹。总结南乡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我心中不由得要赞颂勤劳、勇敢，有强烈民族上进心的南乡壮族人民，40年来，是他们战天斗地，流血洒汗，创造了南乡的繁荣和进步。也不由得要赞颂40年来在南乡乡工作过的各任干部，是他们埋头苦干，

任劳任怨，不断地为南乡的繁荣和进步添砖加瓦、铺路搭桥，才使南乡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开始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事物都是在比较中发展的。与南乡的过去比，我们是进步了，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但是，与先进地区、先进民族相比，我们应该看到，南乡的进步还是很小的；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相比，南乡的进步更是微不足道的。我殷切地希望南乡的干部和群众在读了这本书后，都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南乡今后的进步和繁荣将会更快、更大！

最后，我要代表南乡的干部和群众对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徐杰舜副教授和罗树杰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千里迢迢，与贺县文化馆副馆长刘小春馆员多次到我们南乡进行考察，为我们南乡写出了一本“社会主义的新乡志”，不仅忠实地记录了南乡解放以来社会文化的变迁，更可贵的是还对南乡的变迁作了理论的分析，使我们南乡的干部群众既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又能预测自己的未来。我相信，南乡壮族同胞们是会喜欢这一本书的。

1990年元月8日

于贺县南乡

（孙孝通为中共南乡镇党委书记）

前言

(一)

近几年来，文化人类学的译著蜂起，或美国学者写的，或日本学者编的，或英国学者撰的，也有中国学者著的^①，这表明中国学术界在审视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等领域的同时，已开始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背景，进而希望达到从宏观上更好地把握政治的改革、经济的繁荣、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以便更好地适应当代世界剧烈变迁的大趋势。毫无疑问，这对于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理论和实践是有益的。^②

文化人类学之所以受到中国学者们的重视，原因一方面在于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代表着当代科学发展的新趋向；另一方面其与社会紧密结合，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性，而这两方面正是发展年轻的中国民族学所必需的。众所周知，建国40年来，我国民族学有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1956年前后所开展的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和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大量的民族学资料，出版了360册、5000万字的《民族问题五种丛

^①中国学者著的除港台学者外，国内学者所著的有，张猛等：《人的创世纪》，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

^②当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科学即为文化人类学，其包括考古学、民族学和语言学三个分支。而民族学的概念有较大的分歧，笔者认为民族学是研究当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部分。

书》^①。与此同时，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也作了许多专题研究，如詹承绪等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严汝娴与宋兆麟合著的《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宋恩常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严汝娴主编的《萨满教研究》、马学良著的《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张公瑾著的《傣族文化》、刘尧汉著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庆南与张纬雯合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风情录》、蒋廷瑜的《铜鼓艺术研究》等都是引人注目的著作，而对崖壁画和生殖崇拜文化的研究正在成为民族学的热点。但是，无须讳言，多年来我国民族学界在理论上越来越陷于封闭和僵化的境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对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的关于古代社会学说的肯定，而被我国民族学界奉为经典性的理论，从而使人们滑入诠释摩尔根学说的轨道，造成理论上的封闭和僵化。^②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正好可以打破中国民族学界的这种封闭和僵化，所以文化人类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视。

拜读了一本又一本文化人类学的著作，我们发现外国的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们是十分重视田野考察的，例如美国的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和《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民族进行研究的书，唯有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郝瑞教授，在台湾实地考察了两年所著的《黎舌村——台湾汉族社会文化的变

①《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

②参阅孟宪范：《中国民族学十年发展述评》，《中国社会学》1989年第2期。

迁》(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英文版)。这就使得笔者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即何不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作一典型考察呢?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二)

解放40年来,中国乾坤扭转,各少数民族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迁,无论其解放前处于什么社会形态,甚至于保留有原始社会末期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都无一例外地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前后所作的社会历史调查,虽然基本上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这一历史性的变迁,但是,社会的这一变迁,对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有何影响?由于3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使我国学者未能在1956年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下去。而现实社会生活中,4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0多年来,少数民族地区与全国一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据国家统计局,40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1417亿元,建立起了3.7亿个工矿企业,工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6.6亿元发展到1988年的1092亿元,增长近30倍。历来以农牧业为主的民族地区已建立了现代工业的基本体系,工业总产值达到686亿元,比解放前增长123倍。古老的粗放耕作方法开始被机械化农具所更替,农业总产值40年间增长6倍,粮食产量增长1.8倍,棉花产量增长8倍。1988年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82亿元,比1952年增长17倍。电视机、录音机、缝纫机、自行车、摩托车等现代化的中高档消费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上已成为畅销货,这是有目共睹的。①同样,无须讳言,与全国先

①参阅《人民日报》1989年9月11日第1版。